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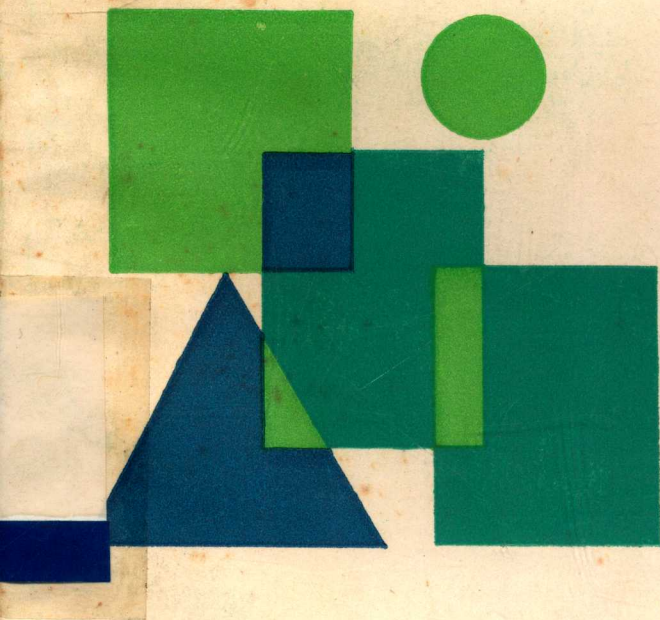
结构主义时代

从莱维·斯特劳斯到福科

〔美〕伊·库兹韦尔著 ■ 尹大贻译

本书系介绍六十年代继存在主义之后在法国风行一时的结构主义思潮的综论性著作。书中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论述了五位结构主义思想家和三位反结构主义思想家的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独特见解及其社会背景，向读者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思想画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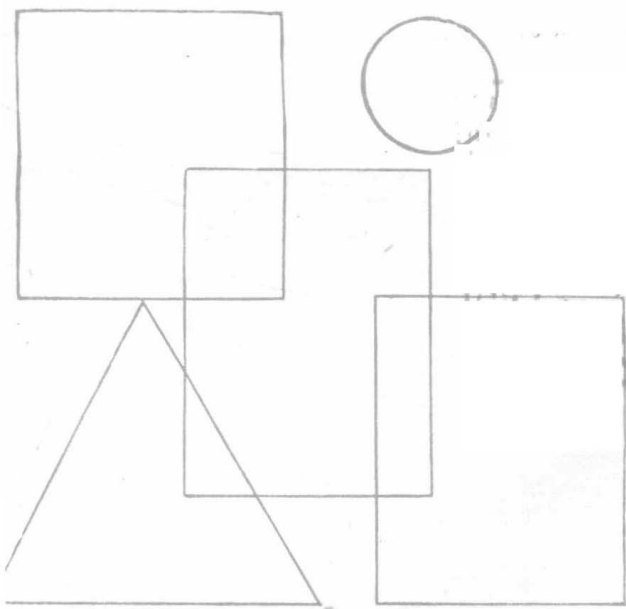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结构主义时代

从莱维-斯特劳斯到福科

〔美〕伊·库兹韦尔著 ■ 尹大贻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Edith Kurzweil
THE AGE OF STRUCTURALISM

Lévi-Strauss to Foucaul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本书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译出

结 构 主 义 时 代
——从莱维-斯特劳斯到福科
〔美〕伊迪丝·库兹韦尔 著
尹大贻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6.75 插页3 字数200,000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册

ISBN7-5327-0077-1/B·11

定价:2.45元

译 者 的 话

结构主义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法国取代存在主义而风行一时的一种哲学思潮。它的核心是结构主义方法，这种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许多学科之中。

结构主义的先驱者是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他晚年在日内瓦大学的教学中，提出了语言的结构主义模式，强调研究语言的同时性结构比研究语言的历时性结构更为重要；他提出将语言与言语加以区别，认为语言是相互差异的符号系统，而言语则是语言的个人声音表达。他认为，语言的意义依赖于一个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如有上才有下，而不依赖于它和外界事物的关系。索绪尔的语言结构观点，通过布拉格学派语言学家雅可布森而为法国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所继承发展，提出了结构人类学理论，并正式运用了结构主义这个哲学名词。莱维-斯特劳斯研究了巴西内地印第安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用结构主义方法解释亲属制度、图腾制度和神话流传等方面的问题。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把结构主义方法用于研究人的无意识活动，认为无意识结构与语言结构相类似，强调无意识就是主体与他者（包括他人和环境）的交流，他在“镜象阶段”的理论中强调人的认识与个性是在社会关系中逐渐形成的。福科把结构主义方法用于研究思想史，提出了“认识型”的理论。认为“认识型”是一个时期的知识的潜在结构，它是静止的、同时性的、彼此孤立的无意识结构，并认为欧洲近代思想发展经过了三个结构，即文

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结构,古典时期(十七、十八世纪)的认识结构和十九世纪以后的认识结构。阿尔图塞把结构主义方法用于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结构主义的解释,认为马克思主张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结构的因果性,因而用多元决定论代替了一元决定论。一般把莱维-斯特劳斯、拉康、福科、阿尔图塞等人的观点称为前期结构主义。

以皮亚杰和戈德曼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观点称为发生学结构主义。皮亚杰在心理学研究中,认为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内在结构的连续的组织与再组织的过程,强调了认识结构的流动发展过程。戈德曼以皮亚杰的观点结合卢卡奇的社会理论说明社会发展,认为一个阶级以其“可能的意识”,通过社会实践而以一种结构影响社会发展。发生学结构主义可以看成是前期结构主义的一种形式,在对结构的看法上两者是一致的。前期结构主义的共同特征是通过模式认识事物的内在结构,结构具有整体性,整体各部分相互联系、自行调整,同时性结构研究比历时性结构研究更为重要,人是社会的一部分,应从社会结构中来看人的认识等。这个理论的困难是结构如何发展的问题,发生学结构主义在这方面有所前进。

后期结构主义就着重于解决结构发展问题。后期结构主义的代表巴尔特和德里达在发生学结构主义的结构再组织理论影响下,不承认有固定的结构,认为结构不断发展。如阅读一本文学作品,评价一部著作,认识社会现象等,都是抹去前面的认识结构而代之以以后一个结构,因而就只有结构的流动,而没有了稳定的认识结构。后期结构主义的这种看法使结构与历史在结构系统中达到了统一,但它把认识完全看成主观的活动,就破坏了强调知识的确定性的西方传统哲学,也破坏了前期结构主义所强调的认识结构。

总的说来,结构主义继承以前思想家的成果,探讨了一些哲学上的问题,如整体与成分之间的关系,在认识过程中心理模式的作用,认识模式的可变性,模式与结构的不同与联系等,可作为进一步发展哲学的借鉴。但是应该指出:结构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结构主义所说的结构不是事物的结构,而是人的心理模式整理现象材料而达到的认识结构。这种哲学认为经验现象是混乱的、变动的,要找出它的秩序,就先要有一个心理模式,用这个心理模式与经验现象比较,看能不能与经验现象相符合,能符合的就是正确的模式,也达到了相对的现象的结构;不符合的则是不正确的模式,必须加以变换,因而要求有一整套的模式变换形式来说明一切同类经验现象。这种理论以主观模式说明客观事物,只停留在对现象作实证的说明,而忽视对事物本质的反映。阿尔图塞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论,他所谓反对经验主义,就是反对反映论;他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认为实践不是客观的实践,而是理论对经验的改造;他提出社会多元决定论,不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阿尔图塞的这种理论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即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结构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

由于结构主义提出了一些哲学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而且目前的西方哲学已经在结构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因而有一部比较充分地说明结构主义的源流和去向的著作就是十分需要的了。现在译出的这本《结构主义时代》就是这类书中比较好的一本。

本书是作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全面研究以后写成的,它占有大量的原始材料,综合研究了结构主义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包括结构主义哲学家与非结构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又纵观其发展

脉络,论述有一定的深度。本书在选择、编排、叙述上有整体感,似乎是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想发展的缩影。它不是从单一学科出发,也不是从单一的结构主义出发,而是以八个不同学科或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作为研究重点。在五个结构主义者中,各人的研究领域不同,研究方法也不完全相同,在这个思潮发展中的地位也有所不同。三个非结构主义的哲学家从不同方面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也以不同的方式对结构主义作出了反应。在这种鸟瞰式的论述中表现出这个哲学思潮的丰富多采,这正符合结构主义的特点,因为它不是一个严整的思想体系,而是以结构主义方法贯穿于许多学科和思想形态之中的派别。这也很好地表现了“结构主义时代”的特点,在这个时代,结构主义者和非结构主义者都在结构主义的支配下,结构主义成为这个时代的思潮。

本书各章的叙述各有重点,在论述莱维-斯特劳斯的 思想时,注重于他是结构主义思潮的开创者,这就要说明这种思想的继承来源、开创性,以及这种思想与其他派别的关系。阿尔图塞一章着重说明了他如何把结构主义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的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阶段论,以及运用巴歇拉尔的思想决裂理论的意识形态论。拉康是精神分析学家,他的思想特点是把结构主义运用于无意识的研究。这种特征使他与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理论上有所不同,也使他成为结构主义思潮的创造者之一。巴尔特是文学理论的结构主义者,是后期结构主义的代表。本书着重于他的思想的演变过程,从巴尔特思想的变化已经可以看出从前期结构主义到后期结构主义的演化过程。对最后一个结构主义者福科的论述使人深感兴趣,因为福科的学识是多方面的,他的多方面研究与不同寻常的新角度的研究,使他成为结构主义的历史学家,而不是一般的历史学家。他善于选择新

题目，运用和发掘新材料，得出出人意料的新结论。

读了本书对三位非结构主义者思想的论述，使人的确感到，要表现这个时代的思潮，就不能不研究这些非结构主义者与反结构主义者的思想。列斐伏尔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或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社会学家，也运用了结构主义思想，研究了作为结构主义基础的语言学。里柯是神学家、道德论者、释义学家。他是正统的思想家，但在这个结构主义时代中他实际上从结构主义中吸取了养料。从他对释义学的贡献来说，他还是结构主义向前发展为释义学、符号学的前驱者。作者给论述社会学家图南一章的题目是“没有结构主义的结构”，这说明图南的社会思想也没有离开结构。三位非结构主义者的思想说明他们都没有离开这个时代。

本书对前期结构主义与后期结构主义的区分已得到学术界的同意。作者把后期结构主义分为三类，一是围绕着时间与空间问题进行的讨论，这一类问题大多属于社会学问题。二是“新哲学家”，这些新哲学家大多是1968年学生运动时的积极分子，他们现在诋毁马克思、弗洛伊德，既反对左派又反对右派，甚至反对一切理论体系。三是围绕在《泰凯尔》杂志周围的记号学研究者，他们的代表是巴尔特和德里达，这一派发展成为释义学和符号学。对后期结构主义的分析也是一般的研究者所可以接受的。

自然，本书作者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写作的，但在不少地方注意从社会政治方面说明思想的演变，比如它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的和世界的社会政治情况来说明结构主义的产生与它对存在主义的关系，指出在抵抗运动时期和法国从法西斯政权的占领下解放的初期，知识分子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由于对苏联看法改变，加上存在主义、人道主义干预政

治的抱负的失败，因而使法国哲学转到结构主义。这种分析也还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本书也有不足之处。如全书没有论述发生学结构主义，皮亚杰的名字出现过，但发生学结构主义与前、后期结构主义的关系都没有讲到。戈德曼这位发生学结构主义哲学家的思想也没有详述，这不能不说是从法国结构主义时代中遗漏掉了。另外，对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关系也论述得不够具体，如莱维-斯特劳斯特自称马克思主义是他的结构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这一点就没有详细说明。对马克思思想的一些解释也不够正确。至于本书还讲到所谓“毛主义”对后期结构主义的影响，显然是出于作者的偏见。

目前，结构主义哲学术语的译名尚不统一，译者尽量参照已有译本中大家比较熟悉的译法，是否恰当，请专家和读者指教。结构主义著作比较晦涩难解，本书虽系综论性著作，但难解之处亦复不少，译者学识有限，误解误译之处请予指正。译稿若干章节曾请吕菊林、张廷琛两同志校订，特此致谢。

尹大贻

1987年3月

序 言

当我为《党派评论》写了关于莱维-斯特劳斯的文 章之后突然认识到，一种思想运动虽然没有为人们所理解，却可能成为流行的，这时，写这本书的念头就在我的心里产生了。我自己在那个时候并不知道，要了解结构主义的各种形式还需要学习多少东西。但是我为莱维-斯特劳斯思想所引起的形形色色反响所触动。这些反响只能部分地归之于他是一位法国人，但是这跟他对巴黎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与尊重是有关的。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巴黎人说到结构主义时就不象说到在它之前流行的存在主义那样简单化。有教养的法国人与有教养的美国人一样不了解结构主义。

然而，结构主义对法国知识分子确有影响，而且的确影响了所有其他哲学体系——释义学，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理性主义，等等。因此，我在本书各章中论述了最有代表性的结构主义者（在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文学和历史中的结构主义者），也论述了结构主义的反对者（在马克思主义、释义学和社会学中的反对者），所以，这本关于结构主义的书也是把结构主义放在它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中来论述的。因为，正如存在主义者在萨特倡导下把哲学理论用于政治目的——无论是按照伦理原则使用，还是诚实地使用——（我认为）结构主义者经常用寻求无意识的结构来回避困难的政治选择。这不是贬低结构主义的目标，或者否认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米歇尔·

福科或罗兰·巴尔特这样的人物的不同寻常的能力。恰恰相反，他们为了发现把人类联系起来的一切共同基础和目的所作的艰苦努力，许诺了每个人都会称赞的理智的和政治的前景。声望不可避免地带来它的通常的副产品——追随的信徒，引伸的理论，记者的采访，人们的崇拜，金钱的刺激，以及通俗化。1968年，无意识的结构仍隐藏未露，经济和政治的结构却暂时崩溃了，结构主义者不得不对他们的各种理论进行再思考。

因此，重要的是在阅读这本书所论述的各位哲学家的思想时要记住，他们总是对比较多的听众说话，而且是就理论争论发言的。有时候，他们必须在话筒和电视摄像机面前重新考虑一些复杂的思想，把严肃的思想与敏捷的巧辩，政治的对策，以及他们必须保卫的观点混合在一起。因为，政治和传统，甚至当它们还不太清楚时，也是在法国知识分子中流传着的。甚至基督教教义通常也影响加缪在四十年代所集中注意的那一类争论，——即涉及纳粹集中营、死刑、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诚实与终极真理等问题的争论。这种主要的哲学争论既为马克思主义者关心，也为保守分子关心，有时候是用结构主义的方式来争论的。这种争论在法国非常热烈，但是在把它翻译到美国的文化时就失去了这种生动活泼的性质。他们熟悉用语言学词汇去讨论社会现象本身，例如，当谈到隐喻时，就偏爱法国的隐喻。不过，这是由于法国人是修辞的魔术师，而且法语具有只有我们的文学结构主义者才关心的精巧性质。

当我开始写这本著作时，美国人还很少听说结构主义。但是，到了现在，结构主义已经超出人类学，在大多数更“高贵的”文学系中讲授了；许多社会学家希望更多地了解某些“结构主义者”。事实上，最近波士顿大学就“文学批评的现状”所召开的会议中，与会者就分为支持结构主义者和反对结构主义者两个阵

营：他们的激烈论辩看来代替了以前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之间的斗争。因此，我的批评虽然是带着欣赏的眼光，而且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仍可能冒犯结构主义者和（或）后结构主义者，他们可能责备我的批评简单化。但是，我企图对法国结构主义作一种鸟瞰式的论述，并使结构主义能够为一般读者所理解；我也为那些已经熟悉其中一位或几位哲学家的思想和风格，但需要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思想产生的环境条件的专家学者写这本书。因此，下列各章不一定要连续地阅读，虽然，从导论和论述莱维-斯特劳斯的一章开始是有帮助的。

本书的写作经过了几次修改，这是因为有了更多的英语著作可资利用，也因为我选择写进本书的主要人物改变了他们的体系，并且我略去了另一些哲学家的体系。在写作的各个阶段，凯·艾吉纳，刘易斯·柯塞，伊丽莎白·多尔顿，莫里斯·迪克斯坦，犹金·古德赫尔特，阿尔文·古尔德纳，乔治·贾斯特斯·劳勒，巴巴拉·罗斯克朗斯和雷内·韦勒克读了其中一章或几章，而且提出了有价值的修改意见。但是，显然，最后的定稿要由我单独负责。威廉·菲利普斯批判地阅读了许多草稿，促使我时而去掉一些内容，时而又加上一些内容。我特别要感谢两位不知姓名的出版社审稿人，他们使我认识到，并非一切批评都是有用的，当时，在两周的时间内，一位说我没有充分讲述福科的马克思主义，另一位说我把福科说成是充分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但这刚好是我希望说明的关于结构主义的许多争论问题之一。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法国朋友们，我所访问过的主人公们。我也特别感谢约翰·穆尔，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本书的编辑，和负责大部分打字稿的卡伦·戴维森。我还要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使我能在1977年留在塞尔伯隆尼镇——这是我唯一的机

会可以摆脱日常的事务,专心地进行研究工作。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孩子们,因为在这段时间中,我往往注意了“这本书”,而不太关心他们了。

伊迪丝·库兹韦尔

纽约 1980年1月

导 言

斯图尔特·休斯说：“绝望年代的法国社会思想从历史学开始而以人类学结束。”说得更确切一点，1955年莱维-斯特劳斯的自传体的人类学著作《热带闲愁》的出版，改变了而不是结束了这个年代的法国社会思想。这本著作不仅使他出了名，而且为他写作《结构人类学》（1958年）和接受结构主义铺平了道路。他系统地尝试揭露深层的普遍心理结构，这种普遍心理结构表现在亲属关系和更大些的社会结构中，表现在文学、哲学、数学中，还表现在推动人的行为的无意识心理模式中。^①从那以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论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式：有些是部分地使用莱维-斯特劳斯的方法；有些是绕开他另搞一套；还有一些直接使用语音学学说的特定组成部分。但是，因为是莱维-斯特劳斯第一个把索绪尔的语言学运用于社会科学，所以我是从与莱

① 关于巴黎结构主义的这个定义忽略了诺姆·乔姆斯基对语法的“结构主义的”探讨，这个观点假定个人心理有一些普遍的（深层的和生成的）结构，这些结构使他们能正确地使用他们自己的本国语。它不涉及皮亚杰的结构主义，这种观点被认为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学说（不与其他的方法相联系），它主张结构与发生是相互依存的，并没有与构造相分离的结构。参见皮亚杰的《结构主义》（纽约，哈珀“火炬丛书”，1970年），第140—143页。关于对这个问题的一种“易于理解的”讨论，可以参见诺姆·乔姆斯基的《语言与责任》（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79年）。（本书根据与米特苏·罗纳特的谈话整理出版。）除此以外，我目前是作为一个观察者而不是作为一个支持者来使用结构主义这个术语的。

维-斯特劳斯思想的关系来估价其他结构主义的。我集中说明(特别是在结论中)他对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索绪尔的理解,并集中说明结构主义的分析所产生的理智的区别。

因为这种对结构主义的鸟瞰不是从单一学科的观点出发的,所以,我选择了一些属于不同学科的学者作为研究的重点。因此,本书各章所论述的八位思想家并不都是(或者曾经是)结构主义者;但是每个人各代表一种特定的倾向、方法和理论来源;他们在内容和格调上都各有不同,我希望转述出他们的某些“难懂的”语言,也转述出他们的不同的格调。例如,巴尔特幽默的经常令人讨厌的轻率语调不能不转述出来。列斐伏尔的唯心主义和嘲讽语气不能用福科描写疯人院和麻风病院的同样语言来叙述。拉康“无意识的文本”的神话学必须与莱维-斯特劳斯的与文化相联系的土著神话对照起来看。例如,布东区分方法论的结构主义和属于人文科学的哲学的结构主义,虽然莱维-斯特劳斯对两者同样使用。而且,他还说:

这种混淆似乎有地理上的限制:哈里斯和乔姆斯基在方法论上是与莱维-斯特劳斯一样的结构主义者,但并未从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抽引出特殊的哲学结论。^①

在巴黎,结构主义的时代差不多过去了。然而,结构主义的设想继续渗入法国的思想,给后结构主义提供了一个基础。一直到最近,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人类学家除外)对法国的结构主义思想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虽然,在一些文学部门中,越来越多

① 关于对各种结构主义的详细讨论,可以参见雷蒙·布东:《结构主义是什么》(巴黎,加利马出版社,1968年),第219页。

地讲到结构主义。不过,越来越多的美国知识分子,原先把结构主义作为表面的、无用的或者难以理解的理论而不加考虑,现在则希望了解它。无论如何,结构主义已经变成人类理智发展过程的一部分。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思想已经历了几个阶段。在抵抗运动和刚刚解放的时期,法国知识分子专心致志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后来,在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越来越感到幻灭的思想状况下,萨特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许诺要考虑让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是,当萨特特别是在1952—1956年间公开宣传他的人道主义的时候,他仍然继续支持共产党人(而并不考虑苏联在国内所进行的镇压),因而人们对他的理论产生了怀疑。因此,就有可能促使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新理论产生。但是,我们不能说这里有一种明晰的演替过程;所有这些哲学在某种范围内同时存在,并相互影响。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仅以模糊的形式存在,还以许多明显的形式存在,所以,虽然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以关于人和社会的本性的完全不同的假定作为基础,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的公正原则和社会变革的观点却出现于存在主义者、结构主义者和符号学家的理论中——虽然承认这些理论的人们经常把他们自己看成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同时,人们还会注意到,存在主义和(或)马克思主义的痕迹和影响,不断地在巴尔特、福科、拉康、莱维-斯特劳斯等这些不同的人的著作中出现。

虽然结构主义本身是不关心政治的,但是它有广泛的政治含义——这些含义不是直接表现出来,而是湮没在结构主义本身的各个分支和各种讨论之中。除去它对许多知识学科的影响,结构主义从一开始就给予法国左派一种虚假的政治理论,它不否定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倾向,但是使它们脱离与马克思主义

的直接牵连。

实质上，法国的左派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经历了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所忍受的极度痛苦和剧烈斗争。在五十年代，激进的法国知识分子不能再回避承认俄国共产主义的冷酷无情的现实，这一现实使得马克思主义实验的失败惹人注目。但是，在法国，脱离苏联阵线的这种转变，不仅包括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分裂，而且还倾覆了长期存在的政治联盟。法国共产党人不象美国共产党人，他们总是在一个广泛的政治基础上活动，而且早就有强大的工会的支持。左派的享有盛名，掩盖了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激进分子之间实际存在的严重分歧，并模糊了他们之间的区别。因此，随着冷战的加剧和对苏联共产主义越来越感到幻灭，曾经把知识分子、工人团体和议会代表联合起来的表面上的意识形态的统一就开始瓦解了。

正当这种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决裂普遍出现时，激进的法国知识分子对存在主义越来越不抱希望。实际上，存在主义者之间的结合一直是脆弱的。存在主义的第一流哲学家的意见从一开始就不一致。例如，萨特讲到他自己与梅洛-庞蒂时说：

我们非常强调个人，从未合作进行过我们的研究，但是我们在保持独立研究时却又成为相互补充的。单独一个人，我们都很容易相信自己已经理解现象学的思想。合在一起，又彼此成为这种思想的歧义性的具体体现。我们各自把另一个人所做的工作看成是对自己的工作的一种没有预料到的、有时候是敌对的背离。胡塞尔曾经成为我们的结合剂，但同时也成为我们的分界线。①

① 萨特：《处境》（纽约，乔治·布雷齐勒出版社，1965年），第231页。